

## 林淵輝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4年9月16日，

14:00-16:00

受訪地點：臺北市林宅

訪談人：李福鐘

紀錄：張峻浩



###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林淵輝 蔡國家等叛亂案 24	臺北市公用事業管理 處汽車課技術員	10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林淵輝先生， <sup>1</sup> 1929年生，屏東市人。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林淵輝於1949年間參加由徐國維所主講之「叛亂」集會。徐國維係利用講解經濟學為名，引誘學生集會聽講，從中毀謗政府，宣傳反動思想。		

### 家庭背景

1929年7月28日，我出生於屏東市。我爸爸在屏東市中心的圓環經營鐘錶店，並且還有兼營一些樂器、唱片的買賣，這些樂器、唱片、樂譜的貨源都是從日本來的，生意經營得還不錯。我們家會兼營這些樂器的生意，是因為有一位屏東女中的音樂老師替我爸爸辦理從日本內地進口樂器、樂譜、唱片等東西進來賣

<sup>1</sup> 目前蒐集到林淵輝先生相關資料，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1）安潔字第2515號判決書。林淵輝先生過去曾接受過歷史研究者口述訪談，但未出版。

的事務，讓他的學生上音樂課時有辦法買上課用的東西，這生意在我出生之前就開始在做了。我們家的人很多，有六個男生，兩個女生，共八個小孩，生活的空間狹小。我的媽媽很忙，爸爸重心都放在店的經營，家裡的各種事務就都由媽媽負責，非常勞碌。在她 50 歲左右的時候，就因為太過勞累而生病，生病期間爸爸太忙而疏於照顧，加上吃錯藥使病情更加惡化而去世了。我媽媽過世的時候，我還在讀高雄工業學校，還在日本統治時期。我爸爸是信佛教的，所以媽媽的葬禮是以日本的佛教儀式辦理，為期兩天左右。

## 求學

我七歲的時候在屏東市讀天主教的幼稚園，因為當時屏東市只有天主教辦的幼稚園可以就讀。幼稚園畢業後到屏東公學校就讀，在屏東火車站附近，媽祖廟的旁邊。我在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一、二年級的老師是出身臺灣的客家人老師，三年級的時候換一個日本人老師教，教一年之後，四年級時換臺灣人老師，他是田徑選手，他跳遠是臺灣第一名，他一直教到六年級。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高雄工業學校。我就讀高雄工業學校時，都是一大早六點多就出門到屏東車站，坐上七點的火車到高雄車站，因為我沒有腳踏車，到高雄車站後還要走四公里以上的路到學校上課，每天就這樣早出晚歸上課。

我讀高雄工業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在戰爭狀態，一年級的時候還有上課，不過每周都會有一到兩次的機會，被徵調去高雄壽山的要塞司令部幫忙修建砲臺的工程。被徵調時會先通知我們，然後隔天就要帶著鋤頭上課，上課沒有很固定。二年級的時候，幾乎沒有上課的機會，一直處於空襲的狀態。爸爸這時安排我們兄弟姊妹到屏東高樹的舊寮躲避轟炸，也因為我離開了家裡，日本政府那時候想找人當學徒兵，就沒有找到我。我同學有去當學徒兵，他說他們的伙食就是飯給你吃到飽，可是菜色很少很清淡。

三年級的時候，戰爭結束，統治政權從日本換到了國民政府。學校的日本人老師都回到日本，學校的老師變成留下來的臺灣人老師，還有一些來自中國的老師，老師少了很多。本來在日本時代工業學校只要四年就可以畢業，不過國民政府來之後，改變學制，變成三年的初級工業學校和三年的高級工業學校，要讀六年才能畢業，所以我又多讀了兩年書才畢業。高雄工業學校的名稱在國民政府統

治之後沒有太大變化，只是從日本時代的州立高雄工業學校換成省立高雄工業學校。

我在畢業之後，到臺北去接受職業訓練，職訓的地方都集中在臺北師範學校這裡。那時候所有的大專、職校的畢業生都被調來臺北接受就職訓練，然後再派到各地去。這時候因為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臺後，原本在各校的日本學生都被遣返回日本，只剩下臺灣學生，因此這些大專、職校接受職業訓練的學生並不多。

## 就業

職業訓練的時間兩個禮拜，教的都是一些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這些東西，受訓完就幫你分派工作。分配的地方有政府機關、公營事業這些地方，會這樣做的原因我想可能是因為戰後日本人才回去日本，因而需要一些技術人才來填補空缺。這個職業訓練不是強制的，要不要來都可以，如果你已經有了工作可以不用來。

我在職業訓練結束後，一開始是被分配到位於臺北西門町的臺灣煤炭公會，不過在報到的時候，因為他們那邊沒有缺額了，所以又回去等待重新分發。新分發的地方是基隆市政府，不過那邊太遙遠，最後再跟爸爸商量後決定還是不要去。這時候剛好我有一個住在高雄的同學，他被分配到臺北市政府，不過他決定不去報到。於是我就幫他拿著報到單到臺北火車站附近的臺北市政府人事室還給他們，在還的同時我順便拿著我的基隆市政府派發單給他們看，問他們能不能接替這個缺額。他們的回應是當然可以，反正你們都是同期訓練出來的，於是我就到臺北市政府的公用事業管理處上班。

臺北市政府公用事業管理處位於臺灣省政府附近，<sup>2</sup>而我則是住在我大姊家，我大姊他們是在臺灣電力公司上班，他們家就在公館羅斯福路上的電力公司宿舍。每天就從那邊坐公車上班，我因為在公用事業管理處工作，所以坐公車都不用錢。

## 被捕

我在臺北市政府公用事業管理處上班兩年多的時間，直到1951年的9月27日。9月27日這天的上午，接近中午的時段，有兩三個人跑來我上班的地方找

---

<sup>2</sup> 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位於今日行政院現址。

我，跟我核對我的資料後就把我帶走。在這之前我就有預感應該有事情要發生了，因為在 1950 年的時候，我們高雄工業學校同屆的畢業生許壽山被抓，隨後就陸續有我們學校的人被捕入獄，許壽山最後被判十年，<sup>3</sup>他是我這個案第一個進去的人。

我們這個案件的發生要追溯到我在高雄工業學校最後一年的實習期間，我們學校規定在畢業前要去工廠實習，我是到屏東糖廠實習。這個時期我們學校有一個同學柯五龍到高雄縣九曲堂的永豐餘紙廠實習，在紙廠他認識了徐國維，因為徐國維的關係，他有可能就因此涉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徐國維出事後，政府開始要抓柯五龍這些相關的人，這時候柯五龍已經畢業，被分配到基隆的工礦公司上班。首先被抓的是許壽山，他在 1950 年時被抓。柯五龍聽到許壽山的事後就開始跑路躲藏，在柯五龍跑路的期間，特務在他住所都有埋伏。這個時期，一樣是高雄工業學校的同學蔡國家，<sup>4</sup>跑去柯五龍在高雄大樹鄉的家要借書，就被埋伏的特務逮捕，他最後是被判死刑。蔡國家的事是由柯五龍在獄中的時候跟我說的，蔡國家應該是沒有參加組織，無辜被牽連進來的。判決書中說我們被徐國維組織起來，可是我們根本不認識徐國維，只有柯五龍認識他而已，我們只是因為認識柯五龍而被牽連進來。

在我被捕入獄的期間，發生過我的小學老師對我家人說，他可以幫忙關說一下，可以減輕我的刑責，想要藉此來騙取利益，不過我們家並沒有上當。

## 東本願寺與軍法處

我被捕後，被送到東本願寺，他們將這間日本寺院改建成牢房，裡面都是籠子，一間一間隔開，空間很狹小，一間都塞了三十幾個人，睡覺很擠。在東本願寺，印象中我有被審問兩次。我在那裡待了三個月的時間，然後轉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

<sup>3</sup> 許壽山到綠島後不久又被送回臺灣，最後另案槍決。見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 年 3 月），上冊，頁 370。另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數位典藏資料顯示，許壽山被槍決時間為 1953 年 1 月，<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93>，引用日期：2015 年 2 月 9 日。

<sup>4</sup> 蔡國家，高雄縣人，因涉入「高雄地區高雄工業學校學校支部案」遭逮捕，1952 年 12 月 14 日槍決，今日臺北市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區」留有其墓碑。參考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網站，<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93>，引用日期：2014 年 12 月 18 日。

在軍法處關的人更多，環境比東本願寺還要擁擠惡劣。睡的地方很小，很擠很悶熱，在冬天都可以不用蓋棉被，睡覺的地方還跟馬桶是在一起的。夏天的時候還要同房的人輪流起來搨風，才有辦法入睡。

在軍法處的日子，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的，每個人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叫出去，自己又會被判甚麼刑。我的牢房前面有一個走道，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走道走來走去。通常一天會有兩次叫人提訊的時間，一是早上的時候，這種人通常都不會再回來，就是叫出去槍斃；另一個時間是下午三、四點的時候，這個通常就是在附近的房間審問後，會再被送回來。

在裡面我有看到一些早上被叫出去就不再回來的實例。有一個來自桃園角板山的老農民，他七十幾歲姓莊，視力不好，在角板山耕作。他會被抓來是因為他曾經收留過逃亡的政治犯，因而被捕。我就看他早上被叫出去後，就不再回來了。跟我同間牢房的一個老人，他是中學老師，他和他老婆都被抓進來，他也是有一天早上被叫出去後，就沒再回來過了。他被判死刑，不過他老婆好像沒有。因為我們在裡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被叫出去，也不知道自己會被判甚麼刑，所以每天都在那邊戰戰兢兢地等待，每個人的心理狀態都很差。

在軍法處關的人，除了我們這種政治犯外，還有一些是流氓。像我就在軍法處遇到一個認識的屏東人，他是流氓，我就很驚訝的問他，你怎麼也來這裡了。

我在軍法處待了差不多半個多月，就因為太過擁擠塞不下人，而又轉送到新店戲院關，<sup>5</sup>在新店戲院待了差不多半年。我被判刑是在新店戲院時的事，距離被捕時間已經一年多。判刑後不久我就被送到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時間差不多是在 1953 年初，在安坑我待了六年多的時間。

## 安坑軍人監獄

在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的政治犯，男女都有。監獄裡人很多，一間牢房通常都住了三十個人，很狹小擁擠。在這裡吃飯，一天兩餐，早上十點多吃一餐，下午三點多再吃一餐，然後就要一直撐到隔天，晚上都非常餓。我們稱這個叫做「一頓久久，兩頓相遇」早上和下午兩餐隔沒很久，可是吃完下午那餐後下一餐就要

---

<sup>5</sup> 原本位於新店街上的新店戲院係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徵收，作為關押人犯之看守所。參閱自林世煜、胡慧玲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6054257.html>，引用日期：2014 年 12 月 18 日。

等很久的時間。在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的菜色很簡單，飯可以让你隨便吃，不過只有簡單的燙青菜。

在新店安坑監獄，大部分的時間都關在牢房裡，一天只有早上吃完飯給你半小時的放封機會，可以出去牢房透透氣。遇到下雨天時，則連放風的機會也沒有。

我在新店安坑待了六年多，這期間由於我家在屏東，路程遙遠不易來到臺北，因此很少有人來探監。

## 綠島第三大隊

1958年7月，這時我的刑期已剩下兩年多，忽然有一天獄方叫我準備一下東西出去集合，出去的時候就看到軍用卡車在外面待命，準備送我們這些政治犯到別的地方。我們一臺車差不多擠了十幾個人，他們就這樣將我們一路載到基隆港口，搭著登陸艇到綠島。這些登陸艇以前是專門運輸物資到金門的船，環境很差。我們坐著一天一夜的船，到綠島中寮附近的海岸，然後綠島那邊再派舢舨船載我們到綠島，上岸後我們走了差不多一、兩公里的路程，到新生訓導處報到。

在綠島生活和新店安坑監獄相比，好一些。住的方面，綠島是分上下舖的，比新店安坑那樣都擠在一起可以說寬敞很多。吃的方面，綠島的政治犯會種一些青菜、還有養雞，以這些來加菜。此外，每個中隊都有四名伙食委員，四名伙委包括煮飯、煮菜、管帳和採買，其中採買可以在班長的陪同下，到市街上買食材。新生訓導處也給政治犯很多出外勞動的機會，可以出去透透氣，不用一直待在牢房裡。兩者相較，綠島的生活條件確實好一些。

我在綠島分配在第十一中隊，屬於第三大隊。第三大隊有9、10、11、12等四個中隊，我們這個第三大隊是1958年一起來到綠島的政治犯組成的，有四百多人。在我們到綠島的時候，已經取消了女子中隊。

## 出獄後

1961年9月，我十年的刑期屆滿出獄。出獄後，我沒有工作，也沒有人敢聘用我，於是我就回到屏東市住，在我們家的店幫忙。在這段沒工作的時間很辛苦，找工作到處碰壁，我還曾經跑去賣過火柴。我出獄之後，由於我爸爸在地方上算

是有些人望的人，和警察那邊關係也不錯，所以管區沒有常常騷擾我們家，我只需要定期到派出所報到。

我出獄後一年多的時間才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是我有一天問我高雄工業學校的同學林澄水有沒有工作可以介紹，他也是跟我一樣被牽連入獄，他就幫我介紹進大榮鐵工廠。大榮鐵工廠位於高雄壽山的臺灣水泥廠對面，在大榮鐵工廠裡面有幾位是政治犯，讓我們這些政治犯有個工作可以做。我從 34 歲開始，在大榮鐵工廠上班。

後來，我又到華祺這家不銹鋼公司上班，做他們的研發主任。他們要重用我會日文的才能，送我去日本學習不鏽鋼的相關技術，為期兩個禮拜。我出國都沒有受到甚麼阻撓，都是公司幫我辦好相關事宜出去。我到日本廣島的光市，這裡有一家叫新日鐵的不銹鋼公司，去那裏學習技術。我和他們那邊的聯繫還不錯，那邊的工程師很願意教我們技術，而且還說如果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傳真過來問。我也會幫忙反應他們的原料有甚麼值得改進的地方，他們的下游公司很少這樣做。我在華祺的日子都是每天從臺北通勤到桃園中壢的工廠上班，一直做到 70 歲的時候才退休。

我結婚時 36 歲，我老婆是我學弟的妹妹，我跟我學弟很熟，知道我的狀況，所以很放心地幫我介紹他妹妹給我認識。我因為工作都在高雄的原因，住所也就搬到高雄。後來因為我大兒子要來臺北念大學，而搬來臺北定居。我生了三個小孩，老大是讀金融的，老二讀機械，在永豐餘紙廠的中國揚州廠上班，小兒子在美國南加大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就在那工作定居。目前我是跟我的老二一家人住。我這三個小孩，都是我老婆辛苦一手帶大的。